

人間四月
芳菲盡

XIA SUI SHENG

夏穗生的故事

中國器官移植先驅

樓惠子 著

自序

器官移植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醫學奇跡，挽救了無數病友的生命。與一般外科手術不同的是，許多時候它必須同時面對兩個生命，同時面對死的無奈與生的渴望，安頓亡靈的同時挽回生命。而移植醫生的眼裏不能有一絲淚水，心裏不能有一毫慌張，手上更不能有一分差錯。

在醫學裏，人類對科學無止境的探索與人類對同類無私的救助使得科學的精神與人道主義的力量熠熠生輝。而對器官移植來說，以一物替一物而救一人，更是彰顯出人類的智慧、勇氣與仁心。這也是為什麼器官移植從其一出世便站在了人類醫學的巔峰之上，被稱為醫學皇冠上的明珠。

人類對器官移植的幻想與憧憬遠古已有之，但在現實中，由於手術难度大、器官排斥反應、社會倫理道德和習俗等種種障礙，人類歷史上第一台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並沒有多長的歷史。那麼，器官移植這個魔幻現實主義醫術到底是怎樣來到中國？並在中國發展起來的呢？

本書希望通過記錄夏穗生，一個中國器官移植先驅的人生軌跡來回答這個問題，一方面是紀念先賢在跌宕起伏的歷史背景中所走過的曲折一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一生的故事正好反映了中國器官移植事業從夢想到現實、從實驗到臨床的歷程。

夏穗生是一個典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生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出生在一個江南地主紳商家庭裏，中學與大學時期在上海歷經了日本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在風雲變換的歷史大背景中，他艱難地完成了全部學業，成為了一名醫生。而戰爭中，他親眼見到了外科手術救人的實效，便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外科的道路。

建國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讓他的理想、志向與難以企及的才華在動蕩的年代裏難以實現，但在無法抗拒的時代洪流中他始終堅守著科學的理想與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無論是早期的肝切除手術、大躍進期間嘗試性的狗肝移植實驗，還是 1973 年開始的 130 例狗肝移植實驗，都反映了他對科學的探索與追求。

改革開放後，已經 54 歲的他奮力改寫命運的苦難、彌補歷史的缺憾，克服重重困難，逐漸將各種不同器官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搬上臨床，開創了器官移植事業並培養了大批接班人。作為中國器官移植的先驅，夏穗生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器官移植事業。2013 年 3 月 26 日，已經 89 歲的他正式登記成為了一名器官捐獻志願者。簽字儀式上，他留下一句話：“沒有器官就沒有器官移植手術，再有能力的醫生也無法挽救病友的生命，所以捐獻者是偉大的，對以

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生來說，捐獻遺體器官是本分工作。”按照他本人生前遺願，夏穗生逝世後捐獻了自己的眼角膜。

本書亦獻給每一位器官捐獻者和他們的親屬，是他們的愛化死為生。

本書的寫作全部基於真實材料，作者試圖將夏穗生與其家族放到他們所屬的時代背景中來敘述，特意將夏穗生的家族背景、成長、求學、從醫的經歷與中國近現代史、醫學史、器官移植史相結合，這種人文歷史與醫學交叉的寫法也使得本書具備了一定知識性與科普性，適合讀者閱讀。

作者使用的材料包括夏穗生日記、手稿、各種書籍文章、口述，還包括了一些他的同仁、學生、鄉親所提供的信息，希望能給讀者們帶來一種家族與個人命運在變幻的歷史背景中浮沉的厚重感。由於寫作內容時間跨度大，作者得到了大量親朋好友的指導、幫助與鼓勵，在此不一一道謝，但請相信作者已經將所有的感激都銘記在心。

當然，最應該感謝的，還是夏穗生。他是個純粹的外科醫生，慣看生死，一生都拿著柳葉刀，站在生死之間，化死為生。而作者所做的，只不過是簡單地效仿他的勇氣，為他寫下人間這生死的輪替。

作者最後一次見到夏穗生是在2019年4月20日，漢口殯儀館，他的追悼會上。在人間四月芳菲盡之時，在放棄了一切旗幟後，他的身上僅覆蓋著白色的花，大概也只有那些潔白無瑕的花才配得上

一個醫生純粹的靈魂。在一切塵歸塵，土歸土之後，留於人間的唯有他的學識、風骨與仁心。

總有讀者詢問，為何本書起名為《人間四月芳菲盡》，是否意為“山寺桃花”才始盛開呢？作者本無此意，斯人來也人間四月，去也人間四月，悲傷而已。可白居易的詩句過於深入人心，仿佛人間四月就必然要跟山寺桃花連在一起。如果一定不能沒有那些桃花，那麼作者以為那些被器官移植術所拯救的病友倒是可以被稱為“始盛開的山寺桃花”，以彌補人間四月芳菲盡的缺憾。

儘管時間總會帶走一切，夏穗生所做的一切還是在拼盡全力為人們留住他們所愛的人。從這種意義上，文學倒和醫學一樣，只不過一個用刀一個用筆而已，他以血水寫就的移植人生，作者在此只是以淚水略述而已，但作者在此所寫的一切也都是在拼盡全力為我們留住我們所愛的人，儘管時間已經帶走了一切。

樓惠子

2020年11月27日於深圳蛇口

第一章

夏家大少爺

1. 江南

一切要從江南說起。

國人對家鄉總是有著超乎想像的執念，人傑地靈這個詞便由此而來，而這個詞用來形容江南再適合不過了。在漫長的歲月中，江南一詞的具體範圍雖然屢有變化，但這都不妨礙它集所有美好於一身，成為那個魂牽夢繞的所在。

到底何處是江南並沒有定論，字面上的江南是長江以南，但事實上絕非如此。江南大可包括蘇皖南部、浙江全部及江西大部，小則僅為太湖東部平原之一角，中則為蘇南、浙北與上海地區。但江南的意義早已經不僅限於地理、文學、藝術、社會、文化的領域，它早已經成了一個情結，一個關於夢和美的想像載體。

不僅數不盡的詩文、繪畫都在竭盡全力地描繪它的美好，命運對它也是格外垂青。早在春秋戰國時，吳、越就已經開發，雖然那時無法與中原相較，但江南的土壤、水利與氣候已經顯示出它的潛力。大規模的移民潮出現在了東晉之後，經濟重心與文化精英的南移被史書稱為“衣冠南渡”。而在南朝統治下，江南的經濟與財稅政策都為後來的唐宋打下了基礎。

錢穆先生說：“下經安史之亂，南部的重要性日益增高，自五代十國迄宋，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過了北方。我們也可以說，唐以

前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後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作者想，錢穆先生的話正是指出了中國史的拐點——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使得北方中原地區受到重創，大量漢人再次南遷。到了五代和北宋時期，江南已經十分繁盛，以至於在北宋末、南宋初，便已經有話“蘇杭熟，天下足”。這一區域，不但農業產量高，還有絲麻茶竹等農產品，物產豐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手工藝的超高水平。水路、沿江、沿海的運輸便利則促進了貿易與城市的發展。

如果說唐之後的五代與北宋依然是在政治上以中原為中心，僅有經濟重心南移，那麼靖康之變後的南宋就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徹底南移了。再後來，經過北方征服王朝的統治，政治中心再回到了北方，但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卻再未北歸，一直留在了江南。

這就是為什麼想要理解江南，就一定要理解南宋。南宋除了經濟上的轉移外，第一次將政治中心轉移至江南。而在我們這個國家，政治總是決定著一切。這次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在南宋江南的重合，造就了南宋之後的整個中國。劉子健先生就曾有一個大膽的假說，他提出：“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中心。”按照此種假設來看，在西學東漸之前，我們的國家應該就延續著這南宋而來的傳統文化，而且這種傳統文化的核心區域，便是江南。

那麼“南宋模式”的傳統文化到底是怎樣的呢？

從經濟上說，江南是富足的，蘇杭本就是天堂，其他城市也大有可觀，是朝廷的經濟命脈所在。此後，元、明、清三朝，江南地

區經濟發展始終居於全國領先地位，這一點文獻中多有描繪，諸如：“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

政治上來說，南宋是政治生態惡化的時期，與北宋“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氣象相去甚遠，當然這個巨大的轉折點便是在建炎南渡的宋高宗之處。在應對女真人南侵的特殊時期，他君權獨斷，任用權相，穩定局面，使得這一君主專政或權相代理的模式延續南宋整朝並定型。再加上後來蒙元專制，明清不說也罷，好在元明清三代江南都與政治中心保持了較遠的距離。

文化上重文輕武，軍人地位低，尚武精神逐漸缺失。此外，科舉定型，大量士人扎根地方，自謀出路。思想上理學興起。理學也稱新儒學，是儒學的升級版用來應對中唐以來的社會新狀況的。從思想史來說，理學的理論很複雜，但此處我們不談架空的理論，而只強調理學的延續下行與具體的鄉村實踐。通過一系列的家規、族譜、地方志、祠堂把新儒家的教條與理念由士人下行逐漸滲透至最基層社會，可以說，南宋以來，一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的社會秩序便是新儒家的理念塑造的。

南宋之後，慘烈的蒙元征服戰爭，對北方進一步破壞，而江南諸城的紛紛投降卻保住了一世繁華。元代，若從江南的發展來看，並不是一個黑暗時代，相反巨大的領土使得江南豐富的物產以水陸兩種方式向更大的世界開放。可宋元時期江南的繁榮卻在明初遭遇挫折，直到明中期，逐漸擺脫了洪武體制與遠離了政治中心後，江南才得以繁榮再現。到了清代，即便後期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洗劫，

江南仍是全國首善之地。王瑞來先生就說過：近世乃至近代，最具中國元素之地，舍江南而無他。

就在這最具中國元素之地，人傑也隨之而來。通常來講，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文化也就越發達。用唯物主義的理論來說，便是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這樣說來，地靈人傑也就自然而然了。但人不會天生成才，教育自是必不可少的。宋代大興科舉，可是員多闕少，到了南宋通過科舉而獲得官位的仕途已經擁擠不堪，這使得不少士人，也就是傳統時代的知識分子們不得不放棄仕途，轉而回鄉發展，扎根地方社會。元代說來也奇怪，這個科舉開了跟沒開一樣的朝代，竟然為後世設立了科舉考試的典範內容，那便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但不管怎樣，元代漢族知識分子並沒有出路，更是只能扎根鄉土，經營家族，以求宗族式發展，而這些背景正是明清強勢鄉紳社會的由來。

在明清江南傳統而典型的鄉紳社會中，浙江餘姚的韓夏村就是其中之一，並不起眼，夏家便是那裏的第一大戶。餘姚自南宋起便屬紹興府。“紹興”本為越州，靖康之變宋高宗一路南逃，到越州後才算勉強站穩腳跟，為了重振山河，在越州由“建炎”改元“紹興”，寄托“紹祚中興”之意，自此越州得名“紹興”。宋元明清民國，紹興府轄八縣，餘姚縣始終為其一，直到本朝才將餘姚劃歸寧波。雖然行政區劃如此，但傳統上、心理上，餘姚都偏向紹興，無論是其口音或是口味。以地圖來看，餘姚本就處在寧波與紹興之間也就是寧紹平原的中間位置，而韓夏村正與紹興市上虞區接壤，因而口音更加夾雜。但無論哪朝哪代，行政區劃如何，韓夏村始終

農業經濟特色明顯，產業以水稻和棉花為主。

生活在這樣的江南鄉村，若沒有堅船利炮和西學東漸，也許一切都風平浪靜，夏家也許世世代代都波瀾不驚，歲月靜好。一個江南的傳統鄉紳家庭能跟器官移植這種現代醫學有什麼關係？如果有關係，那可能就是冥冥中的命運了。

2. 祖宗：南渡之人

《上虞桂林夏氏宗譜》尊英國公夏榮為一世祖，這樣算來，夏穗生是為英國公第三十四世孫。夏穗生的曾祖父夏召棠即為最後一次修譜的主要主持人與贊助人。宗譜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修成，當時夏穗生的父親夏福田年僅4歲，為宗譜所載最後一代，第三十三世。



《上虞桂林夏氏宗譜》

第二章

風雨欲來：從醫之路

9. 滬江大學附屬中學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三十八年裏，內憂外患，經歷了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個政府的更迭，期間又面對著軍閥割據、國共對峙、帝國主義侵略的各種問題，肯定不能被稱作煌煌盛世。但亂世也有亂世的活法，相較而言，最好的一段時光便是1927-1937這黃金十年了。在江南鄉村，夏穗生的童年便在這一段安穩的發展期度過，但童年的平靜與歡樂反而襯托出此後命運的不堪。

通常來講中華民國一般被分為兩期。1912-1927為前期，主要由北洋政府統治，1927-1949為後期，由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夏穗生初入中學是在1935年的上海，而最終大學畢業是在1949年的上海，可以說他是一個典型的二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是最後一批民國造就的知識分子，他的身上有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氣質與風度，令人著迷，無論後來世道如何變遷，這種氣質伴他始終。

其實，文化教育的蓬勃發展並不一定與國家的統一穩定成正比，紛亂的民國在軍閥統治下，思想文化教育反而成為它的一道亮色也是有原因的。這種道理很簡單，就比如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百家爭鳴”也是出現在春秋戰國那個政治上四分五裂，道德上禮崩樂壞的時代，而在秦統一後迅速淪落。

到了民國後期，國民黨形式上統一全國後（1928），文化教育的情形還是有所變化。如果說，北洋時期文化教育多是直接引進學習西方，那麼到了國民政府時代，文化與教育更傾向於一種中西結合的改良文明之路。由於一黨專政，其黨章中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也成了教育的宗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逐漸開始，一直到1945年結束，國民黨教育政策多是一種“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戰時教育政策，這種略顯雲淡風輕的戰時政策，更顯示出中華民族在面對極端困境時的冷靜與堅毅，夏穗生便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走上了求學之路。

作為一個江南鄉間走出來的地主家少爺，夏穗生第一次到達上海時的興奮與驚嘆是難以形容的。他曾經跟他的妻子石秀涓描述過那種類似“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他說他走了兩天的水路從餘姚到達上海，街道上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與往來的人群讓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他很高興能加入其中。毫不誇張，當時的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在亞洲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常聽老人們說，八十年代的上海根本無法與1935年的上海相提並論，也就是說夏穗生50多歲時看到的上海可能還不如他11歲時初見的海，可想而知，這對一個11歲的少年來說是一段多麼激動人心的經歷！說這是花花世界也好，這是自由天地也好，誰會不愛這醉人繁華的不夜城呢？

作為中國風氣之先的租界，上海的現代中學教育也是出類拔萃的。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上海設立了租界，因此成了中國現代西式教育的發源地之一。無論是近代教會學校還是國人自辦的

現代西式學堂，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都是領先全國的。1935年，夏穗生被他的父親夏福田安排進入了滬江大學附屬中學念書，在進入滬江中學之前，他曾短暫考入私立上海中學。滬江大學附屬中學是滬上有名的教會學校，至於為什麼夏福田會選擇滬江大學附中，這裏可能有兩方面考慮。夏福田自己是學習英文專業出身，在當時的上海灘，滬江大學附中的英語水平極高，掌握英語對於求職來說是極其實用的，另一方面，滬江大學附中實為滬江大學的預科班，如果附中成績優良，就可順利進入滬江大學就讀，而滬江大學又以商科最為出名，其實父親為夏穗生安排的還是一條從商的老路。

滬江大學英文名 University of Shanghai，是一所創立於1906年的教會學校，初創者是美國浸禮會的宣教士。浸禮會屬清教徒中的一個基督教宗派，以全身浸入洗禮與民主自由教會為其主要特點。當時，美國浸禮會在上海楊樹浦軍工路（今軍工路165號）購置了一塊約165畝的土地，用於興建學校和校舍，定名為上海浸會大學，並在1915年更名為滬江大學。滬江大學在創立之初便辦有附中，實為大學的預科班，而附中沒有自己獨立的校園，與滬江大學渾然一體。

在北洋政府時期，西方教會有較大的空間可以在中國自辦教育，教會學校之所以為教會學校，主要還是因為其宣教目的，滬江大學的董事會成員、校長全是美國浸禮會成員，從管理到教學也全是教會學校運作模式。滬江大學的首要目標是提供廣泛的自由教育，讓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現代科學以及基督教真理有良好的理解。教會學校的宗教色彩一直就是爭議較大的問題，此處不

議。滬江大學及其附中超高的教育水平，在當時吸引了大量的優秀青年，而且附中從 1921 年就開始招收女生，是中國第一所實行男女同校的中學，可謂絕對的反封建、反傳統的先鋒。



滬江大學附中禮堂（保存完好，位於今上海理工大學校內）

夏穗生雖然就讀於滬江大學附中，但從他後來的作為來看，他並沒有受到多少基督教會的影響。在他成年後的一份材料中，他就曾提到，滬江大學附中是教會學校，可他不信基督。學校的傳教活動他是不去的。相較於基督教，他的內心更偏向於佛教，雖然他也並非一個佛教徒。而他偏向佛教的原因則是，他的母親、祖母以及曾祖母，也就是撫養他長大的鄉間女性都信仰佛教，他還曾提到他的祖母在鄉間擁有一間自己的佛室。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他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

教會學校對他影響有限的外部原因也與他進入滬江大學附中的時間較晚有關。1927 年，國民政府上台後，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限制外國人在華開辦學校，並開始收回一切外國人在華所辦學校的教育權。當時有明文規定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立案，由中國人出任校長。由此，1928 年，第一位中國校長劉湛恩開始執掌滬江大學直至 1938 年去世。滬江大學附中由於其預科班性質，無論是在校舍還是教學資源上，實際都與滬江大學共享，劉湛恩也兼任附中校長達十年之久。

劉湛恩接手後的滬江大學雖然開始力避教會對學術與研究的干預，把宗教課程的地位降低，但實際上，還是應該注意到的是，劉湛恩本人從小便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信仰，他上任後的口號還是“讓滬江大學更中國化，更基督化！”。可見，他成為校長，既可以滿足國民政府“大學中國化”的要求，也可以滿足外國教會“大學基督化”的要求，實際上是一種當時時局妥協的產物。夏穗生便是在劉湛恩執掌滬江大學時期，進入滬江大學附中學習的，他於 1935 年入學，1942 年畢業。

也就是在 1936 年時，國民政府頒布了新的中學課程標準。從中，我們大概可以窺見夏穗生所受之中學教育。初中的課程大致為公民、體育及童子軍、國文、英語、算學、生理衛生、植物、動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圖畫、音樂，很明顯，那時的課程安排已經相當完備，與今日無二。

1937 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時，夏穗生正處於初中階段，全面抗戰的爆發而且處於風暴中心的上海，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儘管

國民黨倡導一種“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政策，但相對於和平年代，高中教育還是有一些變化。1938年，國民黨頒布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其中就包括了戰時教育的九大方針，其完全反映出戰時的應急與參戰需要。例如，戰時教育強調文武合一；農業需要與工業需要合一；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合一；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建立民族自信；加強自然科學，以應國防生產之急需。

從這些教育政策中，可以明顯看出三個方面：文科在於樹立民族精神，鼓舞保家衛國的決心，理科在於軍事與生產應急，體育在於培養全民皆兵。在這樣的精神指導下，1940年時的高中課程設置了公民、體育、軍事訓練及軍事看護、國文、英語、數學、生物、礦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圖畫、音樂。

1935年夏穗生赴滬時，他的父母及叔嫂均在上海，父親夏福田正在滬寧鐵路管理局工作，與他們一同在上海居住的還有他的弟弟夏健生，以當時的家庭狀況來說，雖然不算非常富裕，但他們的生活應該還算可以，父親的工作與鄉間田產的收入完全可以養活三個孩子，但抗戰爆發後，還是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若以1955年，夏穗生離滬赴漢來算的話，他整整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正是人格形成的決定時期，正是這二十年，他從一個11歲的孩子成長為一名能夠獨當一面的外科醫生。

據後人回憶，在滬江大學附中念書期間，夏穗生一家住在黃浦區牯嶺路一帶，而學校位於楊浦區軍工路，兩地相距大約11公里，年輕的夏穗生每天步行上學放學，最少每天行走22公里，如果需要回家吃午飯的話，行走距離更是驚人，而這段經歷無疑鍛煉了他

的身體。後來他成為外科醫生後，在手術台上一站幾個小時根本不在乎，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這段年少時的求學之路。

在家中，夏穗生與他的弟弟夏健生同住，夏健生把他們兄弟倆居住的閣樓稱作“萬卷樓”，意思是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夏穗生則執意給閣樓命名為“春蠶室”，意思是要“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樣看來，漫漫求學路開啟了他對人生的思索，即便是在如此年輕之時，夏穗生已經有了要為某種事業或使命奉上一生的精神了。

10. 孤島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總是想用一朵善意的玫瑰去抹平歷史的傷疤，但歷史顯然沒有任何天真的成分。誰都知道，傷疤可能不再疼痛，但傷疤也不會消失。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緒向來十分驚人，一方面是因為長期意識形態宣傳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到這種仇視敵對情緒有著長久的歷史根據。夏穗生等一眾二十年代出生，在少年時親歷抗日戰爭全程的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抗日民族情緒是我們這些和平時代的人難以體會的。

中國在近代飽受屈辱，而真正讓中國創巨痛深的非日本莫屬。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日本完成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對華侵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簽訂了賠償白銀兩億兩的《馬關條約》，而發生在旅順的大屠殺更是與四十多年後的南京大屠殺如出一轍。甲午戰爭更是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又短暫統一。

第三章 經年相伴

15. 天長地久有時盡



夏穗生與石秀湄的結婚照，拍攝於1952年

民國十八年（1929），石秀湄生於上海靜安區成都北路一個弄堂裏。她的父親是個外資銀行職員，她們家屬於典型的上海普通市民。她的童年就是在公共租界裏度過的，據她講，那是她一生最無憂無慮的時光。

“當時真的那麼好嗎？”

“是的，安居樂業，跟現在一樣。”

這是她的原話。但除了安居樂業之外，她似乎也說不出那時好在哪裏了，畢竟年紀太小。那時正是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可她說她沒聽說過這個詞，這也正常，所有政府都愛吹噓他們的偉大時代，御用歷史學家們創造出來的詞匯對於市井小民來說意義不大。

“後來家裏的情況就沒那麼好了，一是因為打仗，二是因為弟弟妹妹生的太多。”她又補充道，石秀湄是家中長女，共有七個長大成人的弟弟妹妹，還不包括沒養活的，家庭之境況可想而知。

她清晰地記得日本人打來時，她家住在公共租界裏成都北路741弄139號，那時她在上小學。

“37年日本人來了以後呢？”

“我知道日本人來了，但租界裏沒有日本兵，我還記得晚上家裏都不能開燈，門要緊鎖，窗戶都要用紙糊上。我每天都很害怕，怕日本人來。”

這大概就是她對上海抗戰“孤島”時期生活的全部回憶，不知道她是真不記得還是不願意說。

“反正跟現在的電視劇不一樣，但只要過蘇州橋都要給日本兵鞠躬倒是真的。”她又補了一句，這似乎又完全證明了她頭腦清醒。

石秀湄年輕的時候見識過上海灘的十里洋場，雖然等她長大一點時，十里洋場的盛況已過，但那時審美還是不被批判的，而青春期養成的習慣，往往奠定了人一生的審美偏好。與她的兒女輩不同，她明顯沒有“無產階級”或“階級鬥爭式”綠軍裝與豔麗絲巾搭配的審美品味，她喜歡各種口紅、胸針，燙頭髮，穿著打扮還是有意無意的顯露出那種只屬於老上海的芳華。

由於家庭境況不佳，石秀湄念到初二時便輟學了，在家呆了好一陣子，等到抗戰勝利後，45-46年時，她才找到了一個提供免費師範教育的學校，又繼續念上了書。民國時期竟有這麼多免費學校，和夏穗生一樣，石秀湄也是讀了免費學校。這家師範學校“上海新陸師範學校”雖然創立時間不長，沒什麼悠久的歷史傳統，但也算得上是那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中的佼佼者、先知先覺者。新陸師範的超前主要在於它培養出了眾多的革命黨，敢於公開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一輪紅日尚未升起時便已經棄暗投明了。

當然，石秀湄雖然在那裏讀了幾年師範，而且正值國共內戰期間，但還是遠沒有覺悟到這種程度。她回憶到，當時學校裏的學生是公開分成兩派互鬥的，一派是支持國民黨的，一派是支持共產黨的。這個說起來，跟今天還是不大一樣，當時的中國遠沒有今日的中國那麼高度和諧一致，因此只能稱之為舊中國。

當時的石秀涓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哪裏搞得清楚這麼多？對於青春期的女孩子來說，內戰不內戰影響不大，甚至讀不讀書都影響不大，戀愛大過天才是真的。更何況，她的家庭狀況並不好，作為家裏的老大，她若能早些結婚成家也是對原生家庭的極大幫助。

石秀涓與夏穗生婚姻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應該歸結於自古以來將浪漫與愛情排除在外的包辦婚姻。如今，自由婚姻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現代人對包辦婚姻多不屑一顧，殊不知包辦婚姻實為基於社會學的理性選擇。他們是通過相親介紹認識的，大概在1947年之時，當時石秀涓18歲，夏穗生23歲。介紹人是他們共同的親戚，夏穗生的舅媽，同時也是石秀涓外婆的妹妹。這樣的一層關係下，夏穗生和石秀涓本就是沒有血緣關係但有姻親關係的遠房親戚。由於知根知底且家庭處境類似，兩人的戀愛從一開始便十分穩定，無波無瀾，當然浪漫色彩顯然不夠。這亦無妨，在世俗的婚姻裏，一切轟轟烈烈皆為不祥之兆，一切平平淡淡才是幸福法門。

現實中我們可見的，成功的愛情與婚姻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其中男方對女方主動的、堅持不懈的追求便是很重要的一條，又或者說，男方有明顯的意願要組織家庭。作者並不認同男性主動論，也並不是說女性就沒有主動追求愛情與婚姻的權利，以今日男女平權的視角來看，只要是人都擁有權利追求愛情與婚姻，但女性主義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徹底改變千年來形成的兩性關係。作者在這裏只是從歷史經驗來看，在長久的文化傳統之下，女性主動追求愛情與婚姻的結局往往不那麼好。

夏穗生與石秀涓的婚姻也是符合這一兩性規律的。兩人最初被安排在介紹人舅媽家見面，顯然夏穗生對女方萬分滿意，喜歡的不得了。石秀涓年輕時十分漂亮，夏穗生一見傾心也屬正常。可問題出在，女方當時並沒有等同於男方的滿意。據石秀涓回憶，當時的夏穗生特別特別瘦，又高，完全談不上帥氣，也沒有後來杏林泰斗的風範，像個“長廊杆”一樣。但好在兩人有雙方家庭的撮合與支持，便開始了互相瞭解。後人都只是知道夏穗生是個天生的工作狂，心裏只有事業，哪有什麼家庭？但據石秀涓回憶，他的工作狂形象是結婚後才慢慢顯現的，婚前他對於追求自己未來的妻子也是十分上心的，從這裏讀者們也能看出若想讓一個人在婚前婚後完全保持一致是多麼不切實際。

他們談戀愛那會，是在建國前後那幾年，還經歷了內戰，那時通貨膨脹非常嚴重，上海物價飛漲，日子都很困難。47年他們剛認識的時候，夏穗生還在同濟大學醫學院附屬中美醫院上醫後期的課程，還沒有開始實習，石秀涓則在新陸師範學校念書。據石秀涓回憶，夏穗生最常做的事情便是送她上下學，當時上海新陸師範學校在吳淞路，而中美醫院在白克路，這兩個地方離家都不遠，上下學之路也便成了戀愛之路，其實今天的在校學生談戀愛也做這樣的事，看上去差別不大。至於這戀愛路上都聊些什麼，可知的是夏穗生曾經詢問過他未來的妻子，將來是做內科醫生比較好還是外科醫生比較好？石秀涓告訴他外科醫生比較好，對於自己的專業，夏穗生不可能沒有主見的，但這樣的回答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當然談戀愛不能只聊自己的學業與工作，風花雪月是一定不能少的。夏穗生酷愛讀書，小時候讀過不少經典文學名著。據石秀涓後來的回憶，他們談戀愛時，他常常會跟她講起許許多多的經典故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裏的故事都講過。他講的時候信手拈來，絕不是臨時背書可得的。這讓她對他頓生一種崇拜的感覺，漸漸地，她才發現“長廊杆”原來是一個上到天文下到地理樣樣精通的學問家。至此之後，她一生都對這樣一個博學多才、刻苦勤奮的人充滿了崇拜，而這種崇拜遠超於愛。

說起博學多才，夏穗生也十分喜歡寫詩，特別是唐代的那種七言五言，後來也給他的妻子寫了不少，當然讓一個醫學家去當詩人還是有點難度的，所以為了恰如其分地表達出真摯的情感，談戀愛時，他還是選擇了引用摘抄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經典長詩《長恨歌》送給他未來的妻子，而《長恨歌》也成了石秀涓一生中最愛的詩。

《長恨歌》敘事部分太長，恨得太多，作者不再重複，但還是將其中被痴男怨女反反覆復吟唱的詩句摘錄於此，以紀念他們長達七十二年的愛情：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每到周末，他們也會像現在的情侶一樣，去看電影。據石秀涓回憶，他們倆在一起看的第一部電影是《遙遠的愛》（1947年上映），第二部電影是美國電影《金石盟》，後來看多了就記不住了，但前兩部她總是記得。據她說這兩部電影都是浪漫的愛情片，完全

預示著他們美好的愛情。

但實際上，這兩部她印象中的“浪漫愛情片”都十分悲慘，並沒有什麼幸福的結局。特別是那部趙丹和秦怡主演的電影《遙遠的愛》，完全是在講一個男人塑造出了一個具有現代獨立意識的女性，並結為夫妻，但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這名女性最終走上了抗日救國的道路，而這個男人卻不思上進，一味追求安逸的生活，兩人最終三觀不合、分道揚鑣的故事。這是一部典型的民國式正能量電影，結局頗為傷感，如果能在這種電影中看出幸福的味道，那看电影的人恐怕真的是陷入了愛情之中，已經不能明辨是非黑白了。

夏穗生對岳母家的事情也是極其上心的，岳母十分喜歡他。由於岳母家就在中美醫院附近，所以，他常常去幫忙和蹭飯的。他們談戀愛的時候，石秀涓的小妹妹得了肺結核已經病得臥床不起了，當時肺結核的特效藥鏈黴素才剛剛進入中國不久，他就從醫院買藥，拿回家自己給小妹妹打上，這才救回了小妹妹，這當然使石家人萬分感動。從他們婚後的情況看，他與石家人的親密程度遠超他自己的家族。由於石秀涓家弟弟妹妹眾多，他親手給石家寫家譜，並以大姐夫的身份自豪，可謂好姐夫的典範。

1948年，石秀涓從上海新陸師範學校畢業並進入了交通部材料儲運總處張華浜碼頭倉庫工作，這份工作正是夏穗生的父親夏福田介紹的。這份工作在當時有著穩定體面的收入，卻不幸成了她日後遭遇的伏筆。他們的戀愛可謂談得久了一點點，從解放前談到解放後，從舊社會談到新社會，改朝換代也沒影響他們的天長地久。拖這麼久才結婚的原因是當時的中美醫院規定，醫生一定要做到總

住院醫生才能結婚。那個時候，讀完醫後期的課程後，要作實習醫生一年，作住院醫生兩年，這才能作到總住院醫生，到了1952年時，他們終於可以結婚了，一個29歲一個24歲，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晚婚了。

那時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積蓄，收入在當時還算不錯。建國後的第三年，1952年12月20日，他們在滬上老字號“上海新雅茶室”舉辦了婚禮，他們一個穿著中山裝，一個穿著旗袍，正式而樸素。他們邀請了許多人到場來見證他們的幸福，包括了雙方的親戚、領導、同事、同學。石媽媽一家當然是最開心的，一家人包括石秀涓眾多的弟弟妹妹們整齊地參加了婚禮。



滬上老字號“新雅茶室”至今仍在南京路上

但這場婚禮並非沒有遺憾，新郎的父親夏福田沒有能夠出席這場婚禮，新政權似乎不喜歡舊人，而喜歡把人劃歸不同的階級成分，而夏福田的成分似乎已經不能讓他與親人共享幸福了，某種隱約的不祥即將到來。

16. 上海一九四九

七十一年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時石秀涓剛剛20歲，已經工作了一年，她後來回憶，解放前夕她在吳淞的張華浜碼頭倉庫上班，看著國民黨的軍隊從上海撤走，同時撤走的還有一批不合時宜的人，這些人有錢有勢，拖家帶口，要麼回國，要麼輾轉去了香港，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連《上海灘》都是香港人拍出來的。她並不清楚這意味著什麼，也記不住具體日期，但她清楚地記得當時是多事的春夏之交，上海氣溫適中，她穿著單衣。

晚上她鎖好門，用報紙糊好窗戶，關上燈躲在家裏，說是害怕轟炸，37年日本人來的時候她看大人們就是這樣做的。

“可是解放軍又不是日本人，歌裏唱的都是解放軍是我們最親的人，況且解放軍那會還是土八路，也沒空軍啊，天上不會掉炸彈。”

她想想也是。

5月27日夜裏，進入上海市區的解放軍秩序井然，就地睡在馬路上過夜，為了不堵塞主路影響市民生活，他們沿街排好睡出了好長好長的隊伍，凡是看到這一幕的人都明白國民黨真的回不來了，他們輸在了某種在今天被稱為“初心”的東西上。

第四章

動蕩時代中的科學理想

20. 初到漢口

武漢是個神奇的存在，這個不南不北不東不西，充滿了市井碼頭氣息的地方醞釀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變革，命運的指引下千年來的帝制瓦解於此，從那以後，那裏便潛藏著一種不安分的基因，要出事的地方總是會出事。

1955年當夏穗生與石秀涓來到武漢的時候，長江大橋還未建成，所以那時，武漢三鎮還是分離開來的，沒有陸地意義上的連接。從上海西行而來的輪船一般都停靠在漢口江漢關碼頭。漢口位於長江之北，與長江之南的武昌隔江相望。漢口以前是個通商口岸，也就是租界，主要有五國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其中只有英租界（建於1861）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產物，其他租界均在甲午中日戰爭（1895）後產生。

雖然無法與上海相比，但漢口租界亦有相當的規模。租界一向是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之地，得風氣之先。可以想見，只有思想文化傳播到了一定程度，才能醞釀出“推翻帝制”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變革，這種敢為人先的彪悍風氣絕不是憑空而來的。民國時，三鎮一體成型，1927年國民政府臨時遷往漢口時，才取了“武漢”這個名字出來。

漢口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武昌和漢陽則在17日。1955

年5月16日，為了紀念武漢易幟六周年，漢口“解放公園”正式對市民開放，也正是此時，夏穗生一家搬到了武漢。武漢人沒有不知道解放公園的，在那個娛樂匱乏的時代，夏穗生與石秀涓周末時，便時常帶著兩個孩子在那裏遊玩。解放公園離已經改名“武醫二院”的同濟醫院不遠。



五十年代建成的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從上海搬遷來武漢後，夏穗生與石秀涓便一起住在醫學院分配的房子裏，406號樓二樓四號，兩間房，衛生間與廚房都有，大概60平方左右。由於想念孩子與最初的不慣，夫妻二人時常爭吵。建國初期，武醫二院雖是當時武漢的頂級醫院了，但周圍還是十分荒涼，就是從宿舍406號樓到醫院的路上，野草都能長到腰那麼高，一到下雨天更是泥濘難行。在稍晚接來孩子以後，他們的生活才算漸漸走上正軌。由於他們夫妻兩人全職上班，所以孩子們被安排到醫院旁上全托幼兒園，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跟父母團聚，但這已經比武漢上海兩地分隔要好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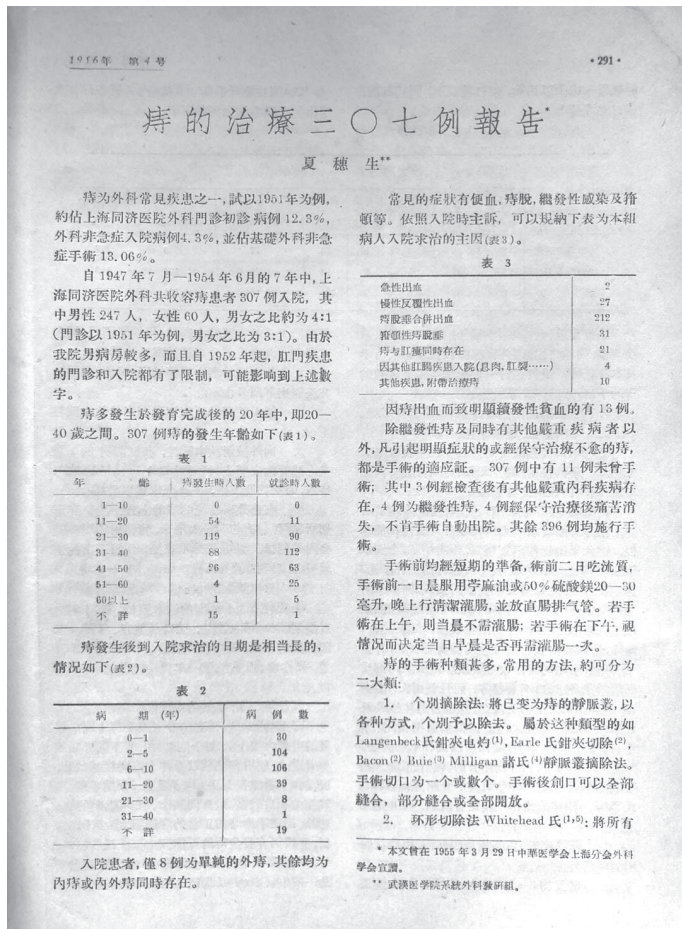


夏穗生夫婦

家務事事無巨細，全由石秀涓一人操辦，舉例來說就是，她的丈夫：手從未碰過人民幣，腳從未進過銀行。他活在一個自己的世界裏，而她雖然牢騷一堆，但心底卻十分欽佩他這種少見的心無旁騖與志存高遠。當然，她的牢騷通常只是為了崇拜做鋪墊的，這種牢騷更像是一種拐彎抹角的浪漫與誇讚，比直截了當的崇拜多了一些情調。

就這樣，只要生活稍微安定下來，夏穗生便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研究之中。據石秀涓回憶，每天晚上在家，夏穗生便是看書和寫文章，沒有任何嗜好，但偶爾也會陪她聽聽音樂，雖然他一度認為音樂也是一種玩物喪志。她清晰地記得他們當時購買了最時髦的東方紅收音機放在家裏，其性質與今天的電視機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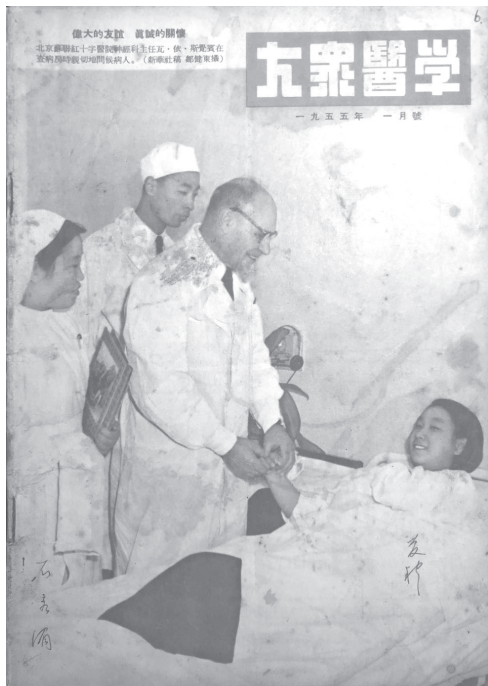
夏穗生在遷漢時已經是主治醫生，除了看病外，還有醫學院講師的任務。在臨床上，夏穗生最初做的最多的是肛腸外科手術。主要因為痔是當時外科最常見的疾患之一。1956年，也就是在他遷漢不久，他便寫出了他最早期的論文〈痔的治療三〇七例報告〉。這份報告集中分析總結了307例從1947年7月到1954年6月這七年中，上海同濟醫院（中美醫院）所收治的痔患者的手術治療情況，也算是對他在上海同濟醫院的工作的總結。由此可見，夏穗生在其極其年輕時，便已經知道要不斷從臨床總結經驗。1947年之時，他年僅23歲，還在醫學院讀後期，尚未畢業，但已經在中美醫院參加外科工作了，早在那時便已經完全可以看出他對待每一個病例的用心程度。



此文發表在《中華外科雜誌》上，1956年第四卷，頁291-295

可惜生不逢時，能讓他全心全意做學問的日子並不太多，他也是抓緊時間，能做多少是多少。搬到武漢後不久，轟轟烈烈的“雙百”運動便開始了，旨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非但沒有帶來言論自由的空間，反而引發了反右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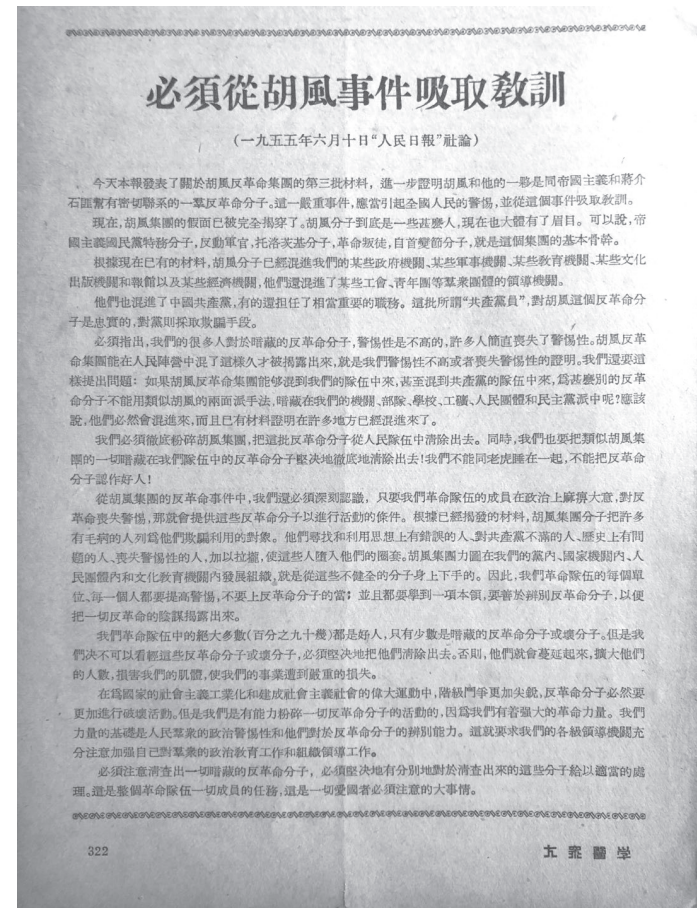
從頭說來，建國後，知識分子的改造早在1951年時就開始了，在所有的領域中，西方的理論和學術必須向蘇聯轉變，說白了，就是要摒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轉而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當然任何時候，思想改造總是在藝術與人文學科中引發極大的震動，自然科學中則相對寬鬆，一部分原因是自然科學深奧難懂，理論如天書，並非人人能懂，外行領導參與感不強。同時，自然科學又有著極其實用的功效，對社會主義建設是頭等重要的，因而自然科學所受到的壓力較小。不同學科雖有鬆緊之分，但知識分子始終被看成是一類人，並沒有跨越階級的不同，改造都是必須的。



“偉大的友誼，真誠的關懷”，1955年《大眾醫學》的封面倡導中蘇友誼

到了1954年時，又一次思想改造運動的矛頭直指人文社科領域的俞平伯，因為他認為《紅樓夢》是一本曹雪芹的自傳而並非批判封建制度的，他成為批判對象則是因為他沒有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詮釋這部清代小說。這似乎與自然科學界關係不大，但很快，胡適就成了下一個批判對象，因為在胡適看來：“科學研究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而不是為了祖國和人民的需要。”對俞平伯和胡適兩人的批判很明顯的顯露出一個信息，在任何領域，政治態度都應該壓過專業學術。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在1955年批判胡風運動中達到高潮。胡風認為作家們應該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用接受官員的改造，顯然這種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是水火不容的，這一次自然科學界也受到波及，自然科學家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看待胡風事件，被認為是他們革命覺悟不高的表現。



1955年《大眾醫學》上刊發了胡風事件的材料

到了 1956 年之時，學術自由度有所放開，因為三大改造即將完成，正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經過胡風事件，消極的知識界肯定熱情不夠，就這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被提了出來，畢竟，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才能使知識界煥發活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話一出來，便立刻招致了當局所不能忍受的各路批評，特別是有些批評已經不是在批評黨的政策而是黨本身了。

事情正在起變化，於是雙百運動在 1957 年時，變成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

雙百和反右的時候，夏穗生並沒有公開說過什麼。原因也很簡單，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主出身的他肯定不是新時代的主人，連算不算得上“人民”都有待考察，況且他還有個國民黨父親，這些家庭成分都很容易讓他成為任何政治運動的靶子，他還是老老實實低頭做事為好，以專研精進技術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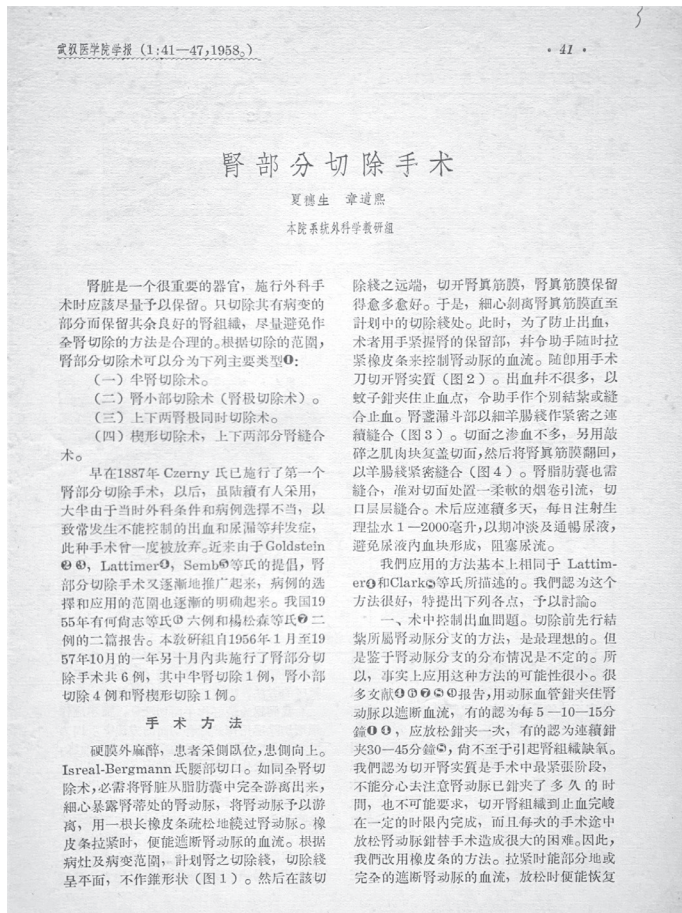
其實，夏穗生號稱“紹興師爺”，出名的有頭腦有見地，愛憎分明，正義感強，十分敢講，甚至口無遮攔，以至於鳴放與反右期間，他的岳母萬分擔心，認定他會被打成右派，而影響全家的前途。就在岳母萬分悲觀之時，夏穗生非但沒事，反而成了當時的紅人。他最終逃過這一劫還是因為他技術過硬，他超高的外科手術天賦與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贏得了外科黨支部書記的青睞。

通常來說，每個單位是有右派指標的，約在 5% 左右，按照當時的說法，這些“右派”就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

到今天為止，全國未被摘帽平反的右派只有 7 人。所以，可以想見，當時每個單位 5% 左右的“右派”根本都是無稽之談。話多一點的就是有言行右派，無言行的就是把刻骨仇恨埋在心裏的右派，其中選誰當右派就大有文章了，各種緣由恩怨夾雜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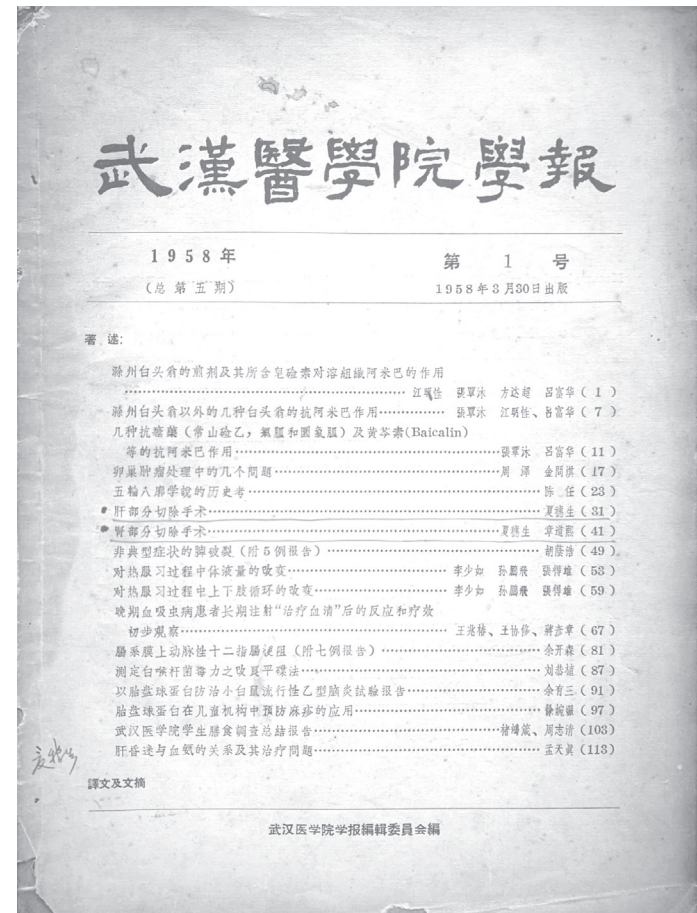
只能這樣說，技術過硬與領導的青睞使夏穗生避免了被選為右派。此外，57 年反右時，夏穗生還相當年輕，只有 33 歲，是一個普通的主治醫生，而政治運動中的靶子多是在某個領域有較深資歷與影響的人，整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政治運動達不到“革命性”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右派”中有一些年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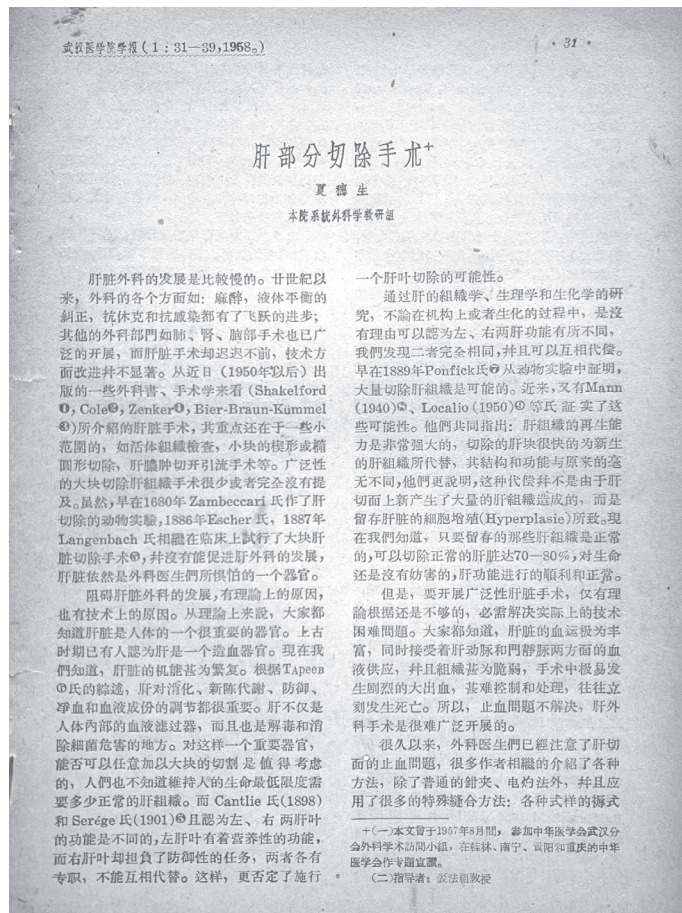
事實上，夏穗生厭惡這些政治運動，一個放棄了一切嗜好、一心專研醫術的人肯定打心眼裏覺得搞這些東西浪費時間且莫名其妙。從他發表的論文就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中後期雖然運動不斷，但他依然在普通外科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且成績傲人。他陸續發表了〈腎部分切除手術〉、〈末端大腸癌臨床治療中的幾個問題〉、〈老年人的外科手術治療〉等幾篇論文，這些論文記錄分析總結了大量他在五十年代中後期所治療的病例。



其中最著名的一篇論文當屬他1958年發表在《武漢醫學院學報》上的〈肝部分切除手術〉一文。我國是肝癌高發的國家，特別是建國初期，由於營養不良，患肝病需要手術治療的人很多。而肝

臟到底能不能切，能切掉多少，怎麼切，都是經過了漫長的科學探索的。要知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時，肝臟還是外科手術的禁區。





論文〈肝部分切除手術〉1958年發表於《武漢醫學學院報》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國外研究者發現左右肝的功能完全相同，且肝臟切除70-80%後，只要保持20%-30%的肝臟便可以再生恢復肝功能。在理論障礙掃清後，操作技術的困難主要在於肝臟

血管豐富，有肝動脈、門靜脈雙重血供，而且肝臟組織非常脆弱、體積龐大，深居右橫膈下，不顯露操作困難。一旦發生出血難以控制，所以止血是肝切除的關鍵所在。在肝臟血管分布、分葉、分段被透徹掌握後，遵循血管分布規律的肝切除才有了可能，這被稱為典型性肝切除。國際上影響較大的成功的典型性肝切除被認為始於1952年。

在我國，夏穗生於1957年開始，施行了五次典型性肝切除手術，並在〈肝部分切除手術〉一文中詳述了手術適應症與手術方法步驟，這被認為是我國病肝切除肝外科治療的開端。這篇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論文發表時，他年僅34歲，算是在中國外科學界嶄露頭角了。此時，他的起步點離世界肝外科前沿並不太遠，以他的心性，他想的絕不是跟他們看齊，而是超過他們。

21. 大躍進與中國器官移植的狂想

在一個專業搞革命的年代，特別是當“紅”蓋過了“專”時，想搞點研究是很困難的，時代容不下一張書桌。

同濟醫院遷漢後，運動就沒停過。55年“批胡風”、56年便開始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讓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57年畫風突變成了整風加反右，這波革命的浪潮終於在58年的大躍進中達到了頂峰。

當然，要搞革命，革命教育是必須先行的。否則，這支帶有德國傳統、從上海遷來的頂級醫療隊伍對廣大工農群眾的理解肯定是不到位的。那麼無產階級的政治教育無非是組織職工們學習毛澤東

第五章

器官移植：魔幻現實主義下的科學

31. 一個幻想與理性交織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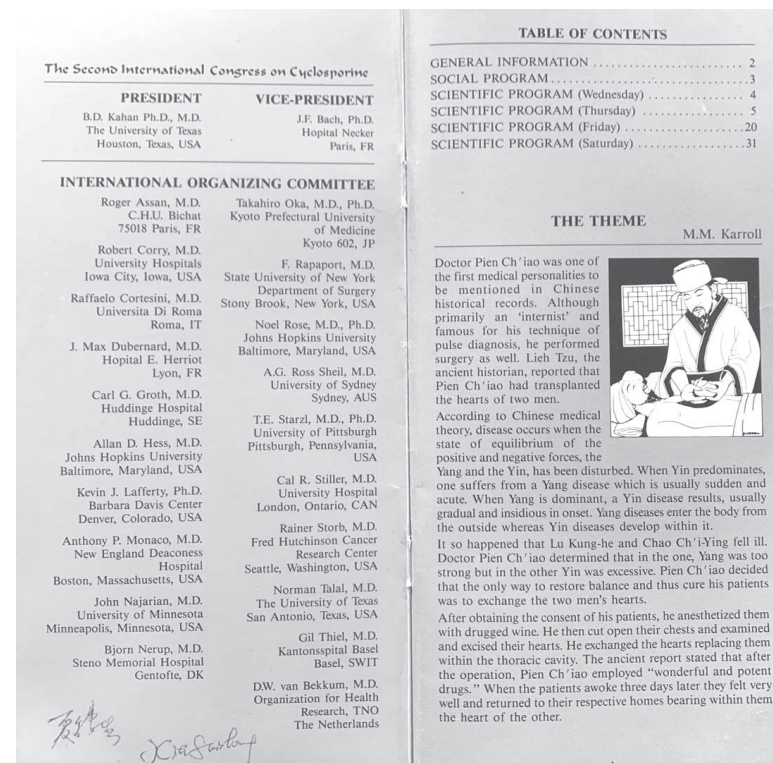


溫情與敬意

器官移植屬現代醫學，源自國外，但中國本土並非沒有器官移植的魔幻傳說。就像中國那些奔流的思想一樣，本土醫學的狂想也可以追述到那個政治上四分五裂，道德上禮崩樂壞的時代。

回憶最初的美好總是美好的。戰國時，天下尚未定於一統，思想尚未定於一尊。那個時候，《黃帝內經》還沒有成為經典，本土醫學可以開顛動刀。兵荒馬亂之中，特別容易激發出某些奇思異想。名醫扁鵲（約公元前 407-約公元前 310）便是這亂世中的一員，他擁有著傳奇般的醫術：換心術，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心臟移植。

《列子·湯問》裏就講述了一個扁鵲換心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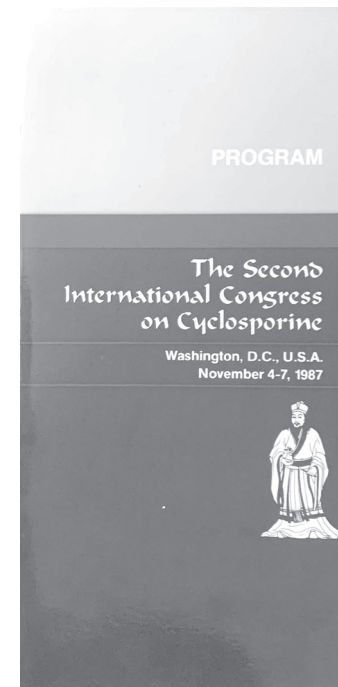
扁鵲的換心術

扁鵲的兩個病人是魯國的公扈和趙國的齊嬰，他倆的疾病似乎是先天性的。扁鵲認為公扈內心深沉而多謀略，但本性軟弱，欠果斷，遇事不敢表態，以致鬱鬱不樂。而齊嬰，思路簡單，但性格倔強，一言不合即發脾氣，逢人就吵。扁鵲在分析後認為如果他們倆把心互換一下，就皆大歡喜了。

在病人同意後，扁鵲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麻藥：藥酒，讓他們昏迷了整整三天。期間，扁鵲開膛，把他們的心取了出來，互換位置，然後敷上神藥。他們醒過來後，一切正常，只是，公扈回到了齊嬰的家，去找齊嬰的妻子；齊嬰也回到了公扈的家中，去找公扈的妻子。當然，他們的妻子都不認識他們了，兩家還因此吵了起來，直到扁鵲說出換心的原委後才停止了爭執。

傳奇故事荒謬而精彩，帶給後人啟發無數。仔細看來，故事裏最大的荒謬就是對人體器官功能的錯誤認識。扁鵲認為心是人思想意識的源泉，所以為了改變兩人的性格，他選擇的是換心，而不是換腦。但故事的啟發性更大，早在戰國時期，人類就已經想到了用更換器官的方式來治療疾病。

1987年11月4日，美國華盛頓，第二屆國際環孢素學術會議將扁鵲敬為會徽高懸，並畫出了換心術的示意圖。夏穗生參加了這次國際性會議，一進場便被這跨越國界的一幕深深感動，他在他的文章中記錄下了這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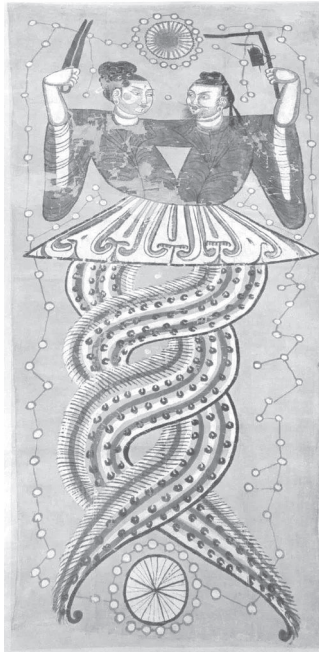
扁鵲會徽

誰都知道交換心臟，並不能治好兩個病人性情上的問題，扁鵲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失敗是成功之母，按照這種思路，世上本沒有失敗，失敗只是成功地找出了許多種不能成功的方法而已，千年之後，總有一天，失敗會將後人送上一條成功之路。

大概這就是人類現代醫學對於傳統最大的溫情與敬意了。

異種移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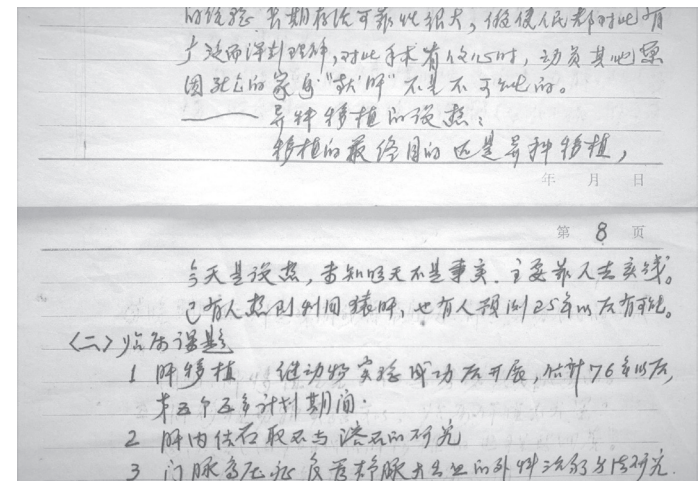
相較於換心術這樣人類間的同種移植，異種移植則更富有魔幻傳奇色彩。世界各個文明都不乏異種生物結合的傳說，華夏始祖女媧伏羲就被描繪成人身蛇尾的形象，還有其他各種文明世界的人頭馬、人頭牛、象頭人、獅身人，林林總總。



中國也有各種詞語表達出了異種移植的意思，最常用的恐怕就是狼心狗肺或狗腿子了，雖然傳統對人使用動物器官總是有些不懷好意，但救人急需時，傳統也是可以變的。事實上，異種間的器官

移植一貫被認為是移植這種替代醫學的最終出路。儘管夏穗生的一生都在做著更為現實的同種器官移植，但他對異種移植是有深刻認知的。早在 1972 年的《關於開展腹部外科研究室工作的建議報告》中就有這麼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語：

“移植的最終目的還是異種移植，今天是設想，未知明天不是事實。主要靠人去實踐。已有人想到利用猿肝，也有人預測 25 年以後有可能。”



1972 年的《關於開展腹部外科研究室工作的建議報告》

現如今距這份報告起草之時，已經整整四十九年過去了。二十五年實現的預測現在看來還是過於樂觀了。當然，這份報告旨在說明肝來源供應是有長期解決方案的。異種移植便被認為是供肝來源的可靠保證。

在供體器官來源上，人類醫學受到了倫理的極大挑戰。最符合倫理道德的器官來源是器官捐獻，但這有賴極度成熟的法律體系，包括腦死亡法與捐獻法等等一系列法律。但即便是這樣，同類器官依然有著供不應求的問題，只要供需不對等，其中的交易便難以杜絕。而任何涉及到人體器官的交易，都會極大程度上挑戰人類的倫理底線，徹底毀掉醫學的初衷。

即便是使用與人類最為接近的靈長類動物的器官，除了異種排斥這一大問題外，依然會面臨各種動物保護組織的不斷抗議。類人動物較為珍貴且繁殖能力有限，高昂的價格也是問題，而且，圈養類人動物來獲取器官聽上去依然會有“人類不應該這樣做”的想法。

各種因素權衡之下，豬的器官成了異種移植的首選，因為對豬的繁殖性消費已經成為習慣，阻力與倫理障礙小得多。但異種移植依然面臨著動物病毒向人類傳播的風險。在異種移植之外，人工培育或製造器官則是一條更有前途與希望的道路，幹細胞的再生功能正在被應用到人體組織或器官的培育中，只是這兩者離臨床都尚有一段距離。今日，真正已經走上臨床的只有同種器官移植。

同種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移植物分為三類：細胞移植、組織移植和臟器移植。廣義上的器官移植包括全部三類：細胞移植、組織移植和臟器移植。狹義上的器官移植只包括臟器移植。

最常見的輸血從理論上來說就是細胞移植。捐血者其實就是捐獻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細胞給有需要的人。

組織移植則有無活性組織移植，例如黏膜、脂肪、肌肉、血管等移植（按照嚴格的說法，無活性組織不算作器官移植）；也有活性組織的移植，例如角膜、腦組織、胸腺組織和皮膚組織等移植。大眾最熟悉的恐怕就是眼角膜移植了。

夏穗生視器官移植事業為他生命的全部意義，他生前參與了中國器官移植發展的全過程。2013年，在他89歲時，他正式登記成了一名器官捐獻者，對於他來說，這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根本不用考慮，他樂意至極。

六年後，他離開人世，他留下的眼角膜依然完好，跟隨他95年的角膜依舊清澈透亮，移植後在兩位病友的眼中得到了重生。



89歲的夏穗生在器官捐獻登記上簽字，2013

狹義上的器官移植就是臟器移植，例如：心、肝、肺、腎等臟器的移植。夏穗生擅長腹部外科，因此，他的主要醫學成就集中於腹部器官的移植，例如肝、胰、脾的移植，但亦包括一些其他器官。

人類器官移植早期在一些組織移植成功的鼓舞下，漸漸走向了大臟器移植。而最早實現移植的人體大器官，則是腎臟。許多人可能有疑問為什麼是腎移植開路，而不是其他器官呢？因為器官移植最終目的是治病，特別是救治重要生命器官如心、肺、肝、腎的無藥可治的終末期疾病。相比之下，首選腎移植做研究，優點很多，如腎臟位置淺顯，鄰近無重要器官，血管分布相對簡單，手術操作方便，不會損傷周圍臟器，而且觀察移植腎的功能有明顯客觀標誌，即是小便，每日排尿次數、每次尿量、尿色、有無出血、感染化膿，一看便知，取標本也容易，結果可靠。所以，器官移植以腎移植鳴鑼開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歷史的沿革也證實了這一科學的預見。

器官移植的三關

夏穗生在一篇科普文章中寫道，器官移植手術三關是：手術技巧、臟器保存和防治排斥。

(一)

手術技巧是第一關。器官移植是高難精尖的特大手術，沒有高超的手術技巧，就完全動不了手。所以，第一道難關就是手術關。手術中別的困難且不談，首先要將主要供血管都接通，這就是

對外科醫生手術技巧的嚴重考驗。如果血管吻合技術不過關，手術後血管不通或堵塞，移植上去的器官就沒有血液供應，自然不能存活，勢必前功盡棄。正是有了血管吻合技術，移植器官才有了血供，一切才有了可能。

世界器官移植的先驅法國人 Alexis Carrel (1873-1944) 就是因為他開拓性的血管縫合技術與器官移植方面的工作而於 1912 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雖然此人後來由於和納粹的關係而備受爭議，但這些都不影響他是一個天才的外科學家。他最為著名的血管縫合三點吻合法據說是從刺繡女工那裏獲得的啟發。後來，他對血管縫合技術已經達到了痴迷的地步，沒日沒夜的練習，直到肌肉的感覺與記憶完全形成，外科手術就這樣成了藝術。

夏穗生極為重視外科手術技巧，千錘百煉。他剛開始進入外科的時候，什麼手術都做，完全沉醉於此。無論是他的同事還是他的學生，在回憶他的手術時都極為驚嘆。



有人說，他動刀乾淨利落，他的手術台絕對看不到一片狼藉的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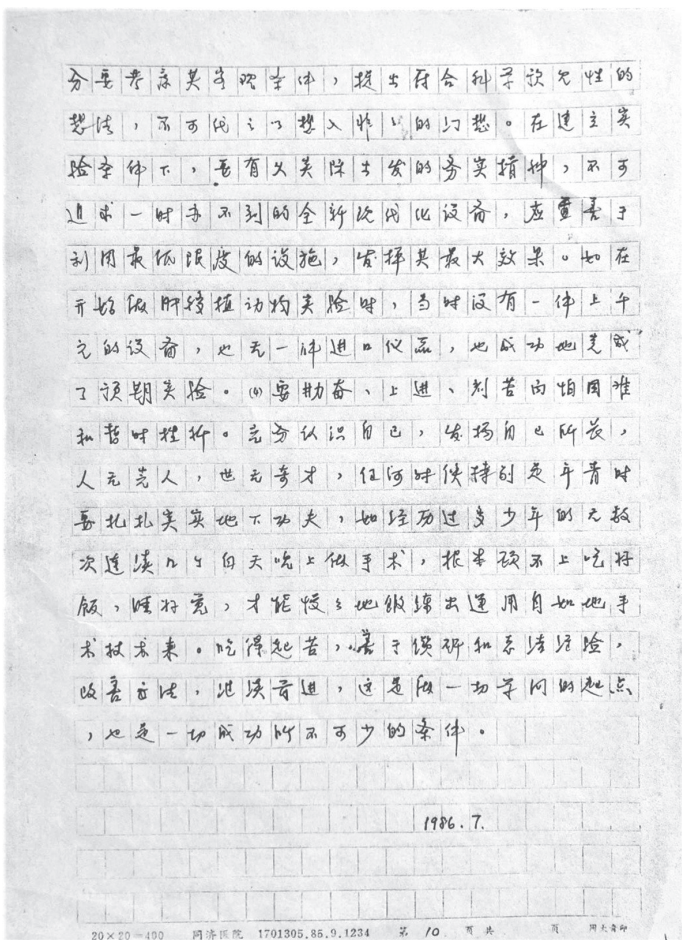
也有人說只記得他的一雙巧手，輕柔一拈，肝臟便出來了。

還有人說，他手持柳葉刀時的蘭花指，真是美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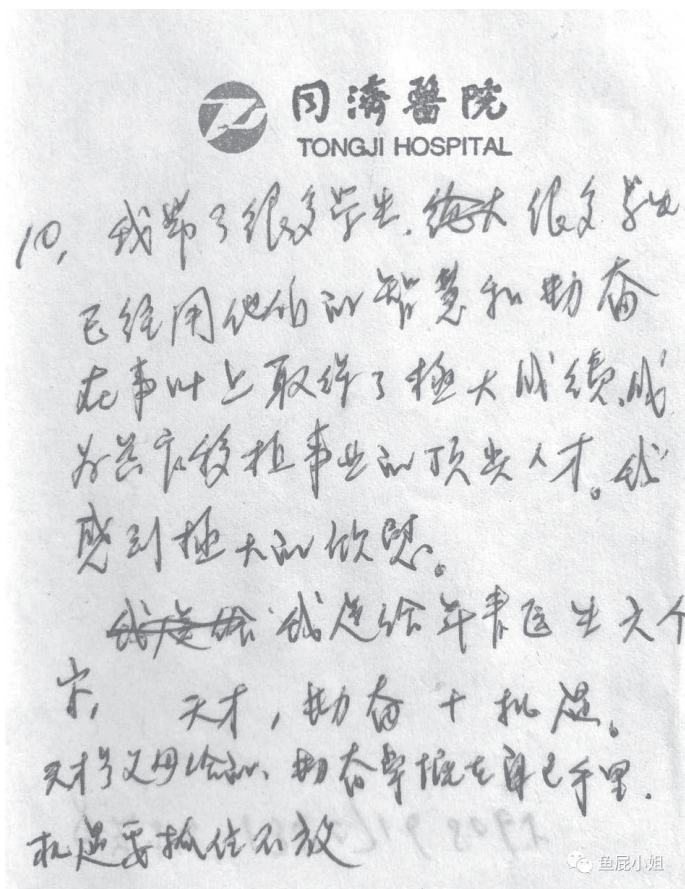
在為人師後，他亦特別強調勤奮練習對於外科醫生的重要性。

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

“要勤奮、上進、刻苦，不怕困難和暫時挫折。充分認識自己，發揚自己所長，人無完人，世無奇才，任何時候特別是年青時要扎扎實實下功夫，如經歷過多少年的無數次連續幾個白天晚上做手術，根本顧不上吃好飯，睡好覺，才能慢慢地鍛煉出運用自如的手術技術來。”



夏穗生手稿



由石秀涓代寫，夏穗生送給青年醫生六個字：天才，勤奮，機遇。

天才是父母給的，勤奮掌握在自己手裏，機遇要抓住不放

(二)

臟器保存則是器官移植手術的第二關。

任何內臟，不論是腎、心、肝等，一旦沒有血液供應，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就會逐漸喪失活力而死亡。有的稍長一些，有的很短很短。如在一般溫度下（35~37°C）肝臟缺血（即所謂熱缺血時間），只要超過 10 分鐘，最多 15 分鐘，就失去活力。腎臟耐受熱缺血時間雖較長，但如果超過半小時，也難指望它還能從損害中再活過來。從臨床經驗來看，要保證術後腎功能良好，熱缺血時間越短越好，最好不要超過 15 分鐘。可是，要求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相對來說較為簡潔的腎移植手術（必須做腎動脈、腎靜脈和輸尿管三個吻合）也是十分困難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經過長期研究發現，要延長缺血器官活力時間，最好的辦法是“低溫灌洗”。在 35°C 時，缺血 90 分鐘的狗肝，移植後全部死亡，但如果降溫到 4~16°C，缺血時間則可以延長。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器官保存液不斷更新換代，保存的時間也不斷延長。

(三)

器官移植手術的第三關則是最困難的排斥關。

人體的免疫系統會自然而然地排斥不屬他自己本身的器官。如何抑制人體的免疫系統？如何讓人體免疫系統接受移植的器官停止排斥？而又如何解決抑制了人體免疫系統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真正的難題，也是器官移植中真正最科學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器官移植很難達到理想的醫療效果。

人有一種微妙的本領，不允許另外一個人的器官在他體內生存，動物也一樣。這是通過很多手段來實現的。最重要的主角是由一種經過胸腺處理的淋巴細胞群，叫做 T 淋巴細胞來扮演的。這種 T 淋巴細胞隨著血液流到移植器官內，與移植器官的細胞一接觸，便能認出這是“異物”。

T 淋巴細胞是如何認出“異物”的呢？原來，人體細胞表面都有一種標誌著個體特異性的物質，叫做組織相容性抗原。這種抗原的結構是如此複雜，以致除了同卵雙胞胎以外，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就憑這一點，T 淋巴細胞便能很快地認出“不速之客”。如果不解決器官排斥問題，器官移植的長期存活似乎就只能存在於同卵雙胞胎之間，連異卵雙胞胎都不行，更不要說其他人了。

夏穗生在一篇未曾發表過的器官移植科普文章中試圖用通俗的比喻向大眾描述人體對移植器官的猛烈攻擊，他寫道：

“人體發現異物後的情形，就猶如國境線上發現了敵軍，軍隊迅速動員起來，配好武裝，大量徵集後備兵的情況一樣，此時，T 淋巴細胞也要經過激化、增殖而形成大量的致敏淋巴細胞。一場向移植器官這個異物發動的摧毀性攻勢開始了，這樣就導致了急性排斥反應的發作。由於上述徵兵備戰的過程需要一些日子，因此急性排斥反應最早在移植手術五至六天後開始，但可以在幾個星期、幾個月，半年內多次重複發生。這場排斥戰一旦打響，病人會突然感覺陣陣寒戰，繼之高燒，從良好的情況中，瞬時間感到難以訴說的不舒服、煩躁、疲倦、移植部位脹痛，移植器官功能突然停止。例

如，移植的腎不再排尿，移植的肝則黃疸直線上升，如果沒有及時有力的抗排斥反應治療，病人就會很快死去。”

只有找到有效的免疫抑制劑來控制排斥反應才能真正將器官移植帶出黑暗時代。所幸的是，英國的器官移植先驅 Sir Roy Calne 在挪威找到了環孢素，在環孢素的應用後器官移植真正的春天到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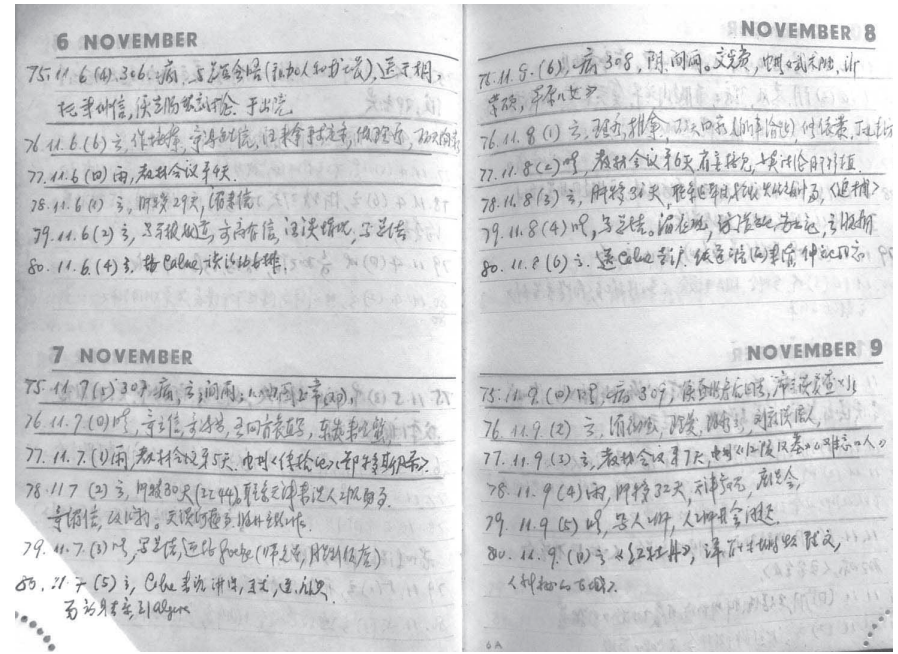
夏穗生第一次聽到器官移植受者的長期生活情況是在 1980 年，就是來自 Sir Roy Calne 的介紹，他是歐洲第一個施行臨床肝移植的先驅，亦是引用環孢素 A 於器官移植的先驅。Sir Roy Calne 在他做完第一百例肝移植後，立即率領一個肝移植手術組，包括麻醉師、手術室護士長和助理一行人，於 1980 年來華進行學術交流。



夏穗生與 Sir Roy Calne

那時的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一切都百廢待興，處於長期封閉中的國人，對國際學術交流是一種渴求的心態。Sir Roy Calne 於 1980 年 11 月 1 日到達北京，在當地接觸到的都是腎移植專家，但他更想看的是難度最大的肝移植，於是轉站武漢醫學院。知道 Sir Roy Calne 要來看肝移植時，夏穗生在一篇他未曾發表的文章中寫出了他的激動：

“我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當時的確亂了手腳，忙著布置實驗動物手術室，徹底做好清潔。康教授在我施行 130 隻狗肝移植的原手術室，表演了一次狗肝移植，他親自主刀，我任第一助手，麻醉師、手術護士和巡迴護士都是康教授帶來的，我實驗室的一班人馬，都做第二把手，好在手術用的器械，都是康教授帶來的，所以移植手術很順利，雙方配合默契，術中每一步驟都得心應手，我在術前非常擔心的斷電沒有發生，手術在大家的微笑中結束。”



夏穗生日記顯示了 Sir Roy Calne 的武漢之行，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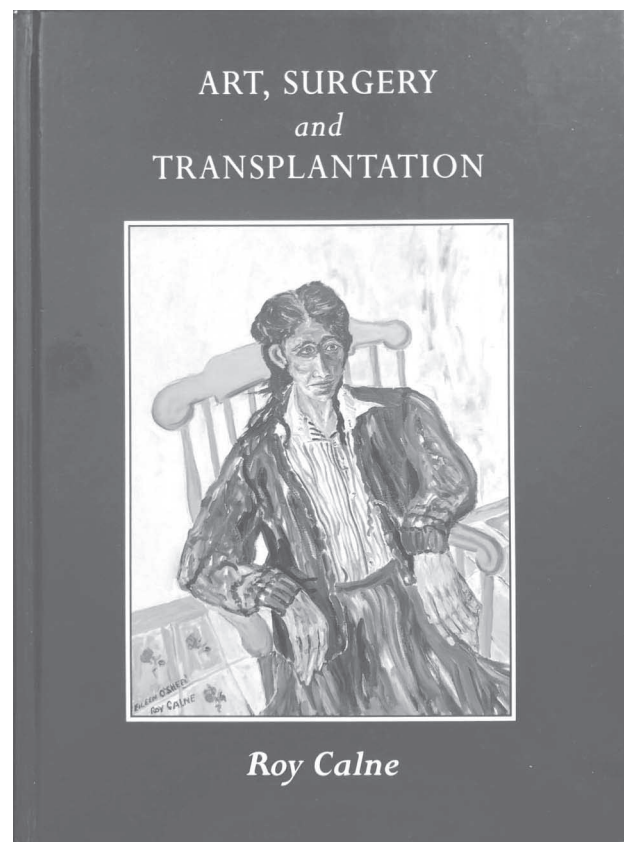
在離開中國之前，Sir Roy Calne 於 11 月 7 日在武漢醫學院學術報告廳做了一次臨床器官移植的學術報告，題為《環孢黴素 A 在腎胰肝移植中的應用和 100 例原位肝移植的經驗》，並在最後綜合總結了他的醫院肝移植病友的長期生活狀況。原文譯如下：“長期存活者情況良好，例如存活 4 年以上的 1 例，最近來信說能背負 5 斤重物，行走 7 天，行程 73 英里，情況良好，另有一例能飛跑，做各種體操，包括全身支撐升降動作”，並放映了長期存活病友的記錄影片。

夏穗生激動地寫下了當天的情況：在場同仁聽完、看完後，掌聲經久不息，如雷動震天，眾人萬分雀躍。這無疑是一劑強心劑，對我國肝移植起了一個啟發和鼓舞的作用。

器官移植病人是可以長期存活的，前途是光明的。

畢竟，就在 Sir Roy Calne 來華訪問的前一年，1979 年 6 月 29 日，由夏穗生主刀的肝移植病友去世。這位病友在接受肝移植後存活了 264 天，這個不到一年的肝移植存活記錄，竟然在中國保持了十六年之久。

可見道路是曲折的，由於療效不佳，沒有人對前途有十足的把握。



夏穗生的書櫃中一直珍藏著 Roy Calne 的油畫集，油畫的主角常常是他的病友



The Moment of Truth

夏穗生的書籤停留在 Sir Roy Calne 的畫作“尋求真理”上



始盛開 山寺桃花

從餘姚到上海再到武漢，
在中國近現代跌宕起伏的歷史背景下，
一個來自江南地主家庭的少爺夏穗生，
是如何在戰火紛飛中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
是如何熬過了建國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
又是如何打開了中國器官移植的大門？
在無法抗拒的時代洪流中，一個知識分子到底能做些什麼？
夏穗生所做的不過是低著頭，
堅守著科學的精神與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罷了。

ISBN 978-988-8743-33-9



9 789888 743339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E.

上架建議：人文歷史／人物傳記／科普
定價：港幣 128 元正／新台幣 510 圓正